

## “日本近代化模式”及其官制“舆情”走向

卓南生 杜海怀

**摘要:**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相对于“明治维新百年祭”(1968年)日本政府的高调庆祝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大型“演出”,今年的日本官方显得额外低调。但在这种低调的表象下实际上隐藏着日本当局紧锣密鼓的修宪路线。回顾半个世纪前日本当局主导“明治维新百年祭”的背景与论争,以及当时佐藤内阁对“反战阵营”采取的长期分化策略发现,今日“日本近代化模式成功论”的死灰复燃事出有因。日本政府有通过鼓吹“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成功来侧面肯定日本近代史,包括其侵略亚洲的轨迹的用心。日本某些学界人士对“ABCD包围圈论”“近代超克论”在内的战前理论的重新包装与提倡、再生产、甚至于“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揭露了“亚细亚主义”的真相与遗毒,昭示任何源自东京的“亚细亚主义”其本质都离不开“日本乃亚洲盟主”的结论框架。只要日本人不放弃二战前的史观,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当前日本政府存在低调中不低调的政治日程与“舆情”走向。

**关键词:**明治维新;国论二分;近代化模式;修宪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4-0014-08

日本政府操纵舆论的手法一向娴熟,正如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当选首相之前接受一家日本刊物采访时所言,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人都倾向于对日本政府的盲从。二战前,日本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政府国定的教科书,而在战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大众媒体。<sup>[1]</sup>“划一性”<sup>①</sup>“煽情性”“集中豪雨式”的日本媒体报道方式使日本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社会舆情的走向。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功地走上了军事、经济强国的道路。对此,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于“日本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疑问。这个问题的弦外之音是日本近代化成功了,为什么中国不能成功?是不是中国哪方面出了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二战以来“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提倡与日本官制“舆情”<sup>②</sup>密不可分的关系,并进而分析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 一、“国论二分”下的“明治维新百年祭”(1968年)

要解读上述问题,首先得注意这些议题设定背后的潜在意识与逻辑,即大前提是先肯定日本“近代化”是成功的。那么,日本的“近代化”是否真的成功了呢?其成功的代价又是什么?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重走日本明治维新当年“近代化”模式的道路?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半世纪前(即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日本国内曾热烈讨论过。

#### (一)回顾“明治维新百年祭”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与50年前的“明治维新百年祭”相比,日本各界的反应显然不

<sup>①</sup>“划一性”即统一口径。日本传媒迄今仍保持着“划一性”的特征,主要源自明治帝国国会成立初期“记者俱乐部”的成立。二战后,美式民主改革虽冀图将日式“记者俱乐部”改为“亲睦团体”的欧美俱乐部,但未奏效。排他性、封闭性甚强的日式“记者俱乐部”迄今仍然是官方操纵舆情最有力的工具。

<sup>②</sup>日本官制“舆情”:即指日本官方诱导下的社会舆论走向。

那么热衷。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时候，在官方的引导下，日本官民一体举国欢庆。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于1966年成立了“明治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首相亲自主持，委员包括内阁阁僚20人，各界的团体代表25人。此外，还有“学识经验者”，即知识分子、著名文化人（包括前东大校长、哲学家、文学家）等42人参加。由如此浩大的委员会阵容可知，当时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是轰轰烈烈的。

之所以出现如此盛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1968年是所谓的“国论二分”的时代。“国论”是指国家的“进路”“国家的走向”。对于当时日本该何去何从，日本国内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简言之，就是舆论一分为二，一边“支持《日美安保条约》”，一边“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方坚持与美国结成军事联盟，是潜在的“修宪派”（尽管当时提出修改宪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内心想要修改宪法者大有其人）。反对势力是所谓的“护宪派”，他们认为《日美安保条约》是将战后的日本人的一切都交给了美国，让日本捆绑上美国的战车。以执政党自民党和最大反对党社会党为代表的这两股势力针锋相对。当时，反对安保条约，拥护和平宪法的反战势力非常强大。他们高喊着：“别把子女送上战场”“好男不当兵”等口号，所以自卫队每年招募队员都一直无法招满。由防卫厅直辖的“防卫大学校”在当时也不被教育界认可。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言：“自卫队就像私生子一样，不受社会的认可。”<sup>[2]</sup>最终三岛由纪夫对政局的发展感到恐惧与悲观，采取切腹自杀的方式，“以死谏国”<sup>[3]</sup>。那时不管是校园内或者大街上，随处可见头戴钢盔、手持“格·瓦拉棒”的学生大跳蛇舞、与警察武斗的身影，许多民众也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和反战集会。

### （二）佐藤荣作政权面对的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潮的冲击下，佐藤荣作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扭转舆情以及分化声势浩大的反战力量。当时，反战阵营主要有三股力量：其一是坚定果断的“反战人士”，其二是讨厌战争的“厌战人士”，其三是害怕战争的“恐战分子”。坚定反对侵略战争的“反战分子”不容易教化，但这部分人员为数不多。毕竟，二战后的日本并不是经过彻底反思而重新走上和平的道路的。反战阵营中人数更多的是“厌战人士”（因为战争没有带来好处，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和“恐战人士”（许多人害怕战争，特别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更令不少日本人“谈战色变”“谈核色变”）。日本政府当时便致力于改变大部分人的“厌战”和“恐战”的情绪，从而分化反战的阵营。

### （三）日本当局采取的长期对策——教科书与大众传媒

日本当局要分化这三股反战势力，最有效的长期对策是通过篡改教科书的内容，让教科书去说服这些“厌战”“恐战”分子。长达35年的家永三郎“日本史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此同时，另一手法是操纵大众传媒，渲染复古情调和提倡战前的精神<sup>[3]</sup>。

不仅如此，为了营造“舆情”，日本政府还策划了大型“演出”。具体而言，就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和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这三项“大型演出”实际上都旨在推动舆论。从表面上看，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要比“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万国博览会”的规模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后两场活动毕竟都是一时性的，而“明治维新百年祭”却能将官方的史观渗透到每个阶层。如前所述，当时，日本内阁网罗了各界名流，成立了“明治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谋求和策划分化反战阵营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有四：一是为了重新叙述历史，歌颂明治维新的光明面，让日本民众走出战争的阴影；二是带回“民族的荣光与信心”；三是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情绪”，炫耀日本的“国威”；四是为了转移国民的视线，企图让国民不要老记住美日安保（AMPO），最好是多思考万国博览会（EXPO），让1970年成为EXPO年而不是AMPO年<sup>①</sup>。

## 二、“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大论争

“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时候，日本知识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有两种截然不同

<sup>①</sup>即较早前时任外长三木武夫所说的，1970年不是安保（AMPO）年，而是万国博（EXPO）年。

的观点。可惜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对“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这场大论争缺乏临场感,甚少有人论之。

### (一)对明治维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从结果来看,日本官方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当时的论争是非常激烈的。“明治维新百年祭”的策划者和支持者认为:英明的明治圣贤引领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促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工业强国,且拥有海外殖民地。与此相反,不少日本开明人士,尤其是史学界,都负面评价日本自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们认为明治以西方列强为范本,奉行“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政策,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起点,也是日本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源头。简言之,日本之所以走上后来的大东亚战争是与当时的所谓“先贤”的决策密不可分的。为此,明治诸多所谓“先贤”“军神”在战败后纷纷遭到强烈批判,并从教科书中消失(但现在又有了复活的迹象)。

### (二)明治维新后的对外膨胀野心与侵略

反对“明治维新百年祭”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对外膨胀和对亚洲国家侵略的历史。他们对当时所谓的明治“先贤”做出的各项国策选择进行了尖锐批判。具体而言,这些国策有:明治维新之后,仅六年的时间(1873年),西乡隆盛就提出了“征韩论”;1874年日本又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1879年消灭琉球国,设置冲绳县;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主张保护“主权线(边境线、国境线)”和“利益线”(日本当局后来高嚷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其实就是此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路线的延伸与发展,这样的“地政学”观也反映在战后日本保守界人士将印尼视为“战后的满洲”的言行上<sup>[4]</sup>);1894—1895年,日本对清朝发动了甲午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在“明治维新百年祭”的反对派看来,盲目歌颂明治“先贤”的功绩及其道路的选择,无疑意味着日本并未吸取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的对外膨胀路线是在“国益论”“国威论”的引导下,以牺牲亚洲邻国的利益为依归的侵略路线。亦即,日本的近代化路线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外侵略的基础之上的。

### (三)歌颂明治维新的最大理论依据——“近代化成功论”

甲午战争本质上是侵略战争,这点在国际上已普遍达成共识。但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刚发生时的阶段。他们先把日本定位为“文明”的近代化国家,而中国则被定位为“野蛮的”“未开化的”国家。于是乎,文明的国家攻打野蛮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义战”。

“义战”论源自欧美帝国主义的“白色人种负荷论”。欧美帝国主义者认为“白种人有义务解放有色人种”。其逻辑是“文明国”讨伐“野蛮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这一理论,甲午战争时被定位为“开化之国——日本”攻打“因循陋习之国——清国”,是对后者的启蒙和教化。<sup>[5]</sup>只要日本国民接受如此这般的逻辑,日本官民便可上下一心毫无罪恶感地对清国发动战争。这样一种“近代化一切论”在近年来颇为畅销的蒋廷黻<sup>①</sup>的《中国近代史》中也可寻见其踪影。这本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近代化”的实现极端重要,只要实现“近代化”就是好国家。诚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从此角度分析,这本书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倘若不计手段,将“近代化”视为“一切”,就未必是正道。所以,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 (四)日媒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反应

所谓“三国干涉”,是指当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俄、德、法三国的逼迫

<sup>①</sup>蒋廷黻(1895—1965),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外交家。1935年,蒋廷黻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

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的事件。得闻这一消息,当时积极鼓吹这场战争的《国民新闻》的老板德富苏峰亲自到前线采访,甚至亲笔书写战地报道。在德富苏峰眼中,将通过武力方式赢得的土地再亲手奉还中国,这是日本的一大耻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痛惜的心情是“欲哭无泪”。为了铭记此耻辱与土地,他在离开旅顺的时候,亲手用手帕将当地的泥土包回日本,暗示着日本有朝一日必将夺回这得而复失的果实。日本所谓的优秀的报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支持程度由此可窥一斑。

另外,还有一份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刊——《日本》,在其专栏中针对这一事件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卧薪尝胆》的文章,其野心更是昭然若揭。日本媒体诸如此类的行为已经远超所谓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明明白白的“侵略主义”,或者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1895年作为甲午战争的战败赔偿,中国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媒体无不对此欢呼。在1901年日本的天长节(11月3日,即明治天皇的生日),《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在其版头页上刊登出将中国台湾纳入日本版图的新日本地图来。<sup>①[6]</sup>

### (五)“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的背后

在“明治维新百年祭”的论争中,谁也不能忽视一位大肆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的专家——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也是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E. O. Reischauer)<sup>②</sup>的存在与影响。赖肖尔对日本的“近代化”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认为日本人应该为“近代化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因为“日本是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而成功的非西洋国家”。但是,身兼外交官的史学家赖肖尔并不是站在客观的历史角度来谈日本的“近代化模式”的。历史的真相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非赖肖尔所言的“自力发展”“外援皆无”,相反,日本是靠侵略起家的,是依靠侵略邻国来获取成功的。正如早年留学日本,致力于日本政治史研究的台湾大学许介麟教授指出的:“对日本的近代化给予‘无偿援助’的,就是韩国和中国等亚洲国家”。<sup>[7]</sup>

赖肖尔还认为“日本迅速达成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国的指南”。这里的“后进国”是指东南亚各国,暗指日本将成为东南亚各国的老大哥。若是在战前,赖肖尔势必不会提出如此观点,因为彼时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双方是敌对国的关系。但是,到了战后,在美国冷战的战略下,美日缔结“军事同盟”性质的“美日安保条约”,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小伙伴。作为美国的外交官,赖肖尔的发言显然另有他意。事实上,日本经济在战后之所以么快就复苏,依靠的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

赖肖尔为了取悦日本,还刻意对德川时代的日本封建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日本的吹捧鼓舞了不少日本的保守人士。毕竟,日本从美国占领军“白脸天皇”麦克阿瑟口中的“第四等国”,到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的称誉为“近代化优等生”,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

彼时日本国内正处于反战情绪的顶峰,关于“近代化模式”的论争也十分激烈,赖肖尔等人“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的言论很快引起各界开明人士的批判。对此,前述台湾大学许介麟教授在其著作中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日本能够这么快速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远远地无法步入现代化轨道?’如果从美国学者‘现代化’这种价值观看来,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sup>[6]</sup>

许介麟教授对外交官兼学者的赖肖尔这种不分黑白是非的“近代化一切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弦外之意是这种观点无异于提倡“侵略有理”。许教授的批判,对于时下有人高唱“日本能,为何中国不能”的曲调,显然值得高度重视和深思。

<sup>①</sup>据日本外交史专家三谷太一郎查阅的报纸原件显示,明治34年(1901年)11月2日,《日本》的版头页上的日本地图还没有纳入“台湾”,而11月3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的同版位置,已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

<sup>②</sup>赖肖尔(E. O. Reischauer, 1910—1990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1961—1966年任美国驻日大使,1966年辞职返回哈佛大学任教。

### 三、日本战败后的反思

“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否值得提倡,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不妨参考以下几个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反应。

#### (一)“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为何得到热捧

首先是司马辽太郎的看法。谈起司马辽太郎,很多人便会联想到李登辉。李登辉之所以公开发表其“台独”的主张是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之后,是司马辽太郎勾起了李登辉对“皇民时代”的缅怀。

司马辽太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他是一名历史小说家。不少日本史学家指出其作品不乏虚构。在“反战”“厌战”“恐战”占主流的时代里,日本民众缺失民族自信心。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明治的国家》《坂上之云》等在战后之所以受到热捧,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主要是他鼓舞了不少日本人,找回了民族的“荣光”。他的作品反复得到了日本主流报纸、杂志的连载和日本电视的播映。这些历史小说的特点是将历史剥开为两部分。他把“昭和史”定位为“黑暗的年代”;而将涵盖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明治史”定位为“光明的年代”。言下之意是,日本是在后来才走歪路的,初期其实是正面的,必须予以肯定。司马辽太郎甚至还强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保卫战”,是“自卫之战”。<sup>[8]</sup>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日人称之为“司马辽太郎史观”),背后潜藏着日本保守派一个极为远大的战略。日本当局明白,想要一次到位否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不现实的,只能依靠分段的手法。我们搞学术研究不仅要细心辩证分析,更要留意总体的“整合性”,否则很容易落入各种假象和陷阱。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原本是连贯的一段历史,是互为因果的。然而,司马却试图将这三个年代进行切割,认为日俄战争之前的日本是“光明的”,“正面的”。战后,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日本以后,也被日本某些学界人士成功洗脑了,认为日俄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大国之战。甲午战争也是日本与清国,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据此来否定两场战争的侵略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两场战争的战地都发生在中国,而非日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总之,司马辽太郎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漂白”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侵略性,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日本人狭隘的“民族自信心”。

#### (二)竹内好对“大东亚圣战”的礼赞

竹内好是“亚细亚主义”的研究者,也是赞美者。竹内好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和研究鲁迅的学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竹内好还是个积极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被誉为“开明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然而,竹内好本人也是一位“亚细亚主义者”,他不认可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因为他认为这是亚洲人对亚洲的战争。但他对日本侵略东南亚,却持不同的态度。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攻打到马来半岛、香港等地方。竹内好十分兴奋和激动,写了一篇臭名昭彰的文章——《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议》,引起了战后日本学界的批判。如果说战争期间,他支持日本向白种人宣战这点还“情有可原”的话,到了战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愈加明朗化了,作为一个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以“开明人士”的姿态出现的知识分子本应收回这篇文章,或者承认这篇文章的错误才对。但是,竹内好坚持不收回,甚至为自己辩护,认为这篇文章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1994年,时任日本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在国会上曾经公开表明,日本侵略中国是侵略,也承认日本殖民统治了朝鲜。但对日本攻打东南亚各国的战争是不是侵略的问题,他表示十分“微妙”。桥本龙太郎这样一种“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与竹内好的思维和逻辑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桥本当时的这番讲话引起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这样一种“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的观点当时却得到了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认可和掩护,最后无疾而终。

### 四、战前理论的重新包装和再生产

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论争是日本国内旗鼓相当的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如今,“明

治维新百年祭”后日本又走过了50年的历程,当年的论争并没有解决,依旧留下许多残留问题。战前诸多理论现在又经过日本官方的鼓吹和一部分保守派文人的响应之后重新包装和再生产,并对亚洲邻国展开了新的攻势。

### (一)“ABCD包围圈论”“部分有功论”

战前日本当局为发动战争,炮制了所谓的“ABCD包围圈论”,A是美国(America)、B是英国(Britain)、C是中国(China)、D是荷兰(Dutch)。亦即日本是在A、B、C、D四国的孤立和包围下被迫开战的。而这样的论调在战后始终未退出日本论坛。<sup>[21]</sup>

另外,以退为进是日本官方与保守人士在论述战争问题时的惯技。翻开战后史,不难发现他们在面对“舆情”不利时,总会在口头上先承认错误,之后便会提出诸如“难道日本是一无是处的吗”“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全都不好”等等问题。这样,“部分有功论”便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就有个别日本新左翼活动家提出,东南亚国家后来之所以独立是多亏了日本先打先锋,赶走了白种人才实现的。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从“全面否定”到“部分有功”,再到全面为侵略正名的动向,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 (二)为“近代的超克”翻案

近年来,常可听到有人谈论“近代的超克”<sup>①[9]</sup>问题。“近代的超克”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彼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官方提出了“打到鬼畜美英”的口号。以“富国强兵”为国策的明治维新百年来的目标就是要“追越欧美、赶超欧美”。不仅要学习“西学”,更要超越“西学”。“近代的超克”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官方提出要打倒白种人的目标,这需要依靠御用文人的舆论宣传来助阵。日本当时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便策划了一些专题,邀来了一些知名文人搞“座谈会”,这些文人不少是哲学或文学出身,他们所谓的论谈“近代的超克”得十分暧昧和模糊。但是“近代的超克”这个词却作为产物遗留了下来。这个概念的提出目的是帮助日本当局用理论、用学理来包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使其“合理化”,旨在说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在向西方、西学挑战,其目的是要跨越西方。

日本战败之后,许多文人一提到“近代的超克”这一敏感话题都觉得是个羞耻的话题,不愿多谈。即便是那些当年参与“近代的超克”论谈的文人战后也都不想再触及这一话题。而竹内好却偏偏要重提这一敏感话题,并认为应该对其重新评价和解读。在反战呼声很高的那个年代,许多人对竹内好的这一提法不以为然<sup>②[10]</sup>,所以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就不了了之。

但在日本迈向“总保守化”<sup>[11]</sup>的时刻,“近代的超克”似乎有死灰复燃的征兆,其特征之一是此类思潮还蔓延到海外学术界。日本有个别自由派学者表示这原本是个敏感的话题,但既然连受害国也有学者正面提及这个话题,日本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了。于是乎,“近代的超克”再次流传。经过重新解读、输往外国之后,据说有些人想当然地就将其用“反对欧美霸权”的哲理来理解,这显然是“美丽的误会”。不仅如此,“近代的超克”还成功地实现了“出口转内销”的转型,经过海外学界的解读和翻译后再重新传到日本,并且影响了日本国内的部分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 (三)“亚细亚主义”布设的诱惑与陷阱

所谓“亚细亚主义”,对于日本人来说,原本就是一个无法说清楚,但却容易诱人堕入“大国梦”的圈套和陷阱。<sup>[12]</sup>为此,我们对于“亚细亚主义”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应该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任何源自东京的“亚细亚主义”其本质都离不开“日本乃亚洲盟主”这样的结论框架。

<sup>①</sup>依《广辞苑》与《明镜国语辞典》的解释,“超克”一词是“克服”与“超越”的意思。针对“近代的超克”这一用语,学界最常引用的说法是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文。根据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书的解释,广义的“近代的超克”,是一个操控了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的流行语,“近代的超克”与“大东亚战争”结为一体,发挥了一种象征符号的功能。它缠绕着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记忆,容易唤起复杂的反应。狭义的“近代的超克”,指杂志《文学界》1942年(昭和十七年)9、10月所载学术讨论会纪要。“近代的超克”一词因这次座谈会而流行起来,成为一个象征符号。

<sup>②</sup>京都大学井上清教授就直接点名予以批判。

第二,日本国内无论是“亲美派(美国重视派)”还是“亲亚派(亚洲重视派)”的论争,其本质都是“日本重视派”。

第三,留意“大东亚理念”的遗毒。只要日本人不放弃战前的史观,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

## 五、结语

相比“明治维新百年祭”日本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今年的“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活动似乎显得低调。之所以如此,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50年前日本官方之所以要高调纪念明治维新是出于软化日本国民反战情绪的动机。但当今的安倍政权已经不需依靠“明治维新150年祭”营造“舆情”。最明显的例子是,原本隐隐约约不敢公开提出的包括“ABCD包围圈论”“近代的超克论”等侵略有理的理论不仅不再是禁区,甚至还被重新包装与“出口转内销”。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歌颂明治维新的日本当局和保守人士而言,他们梦寐以求的“修宪大业”即将大功告成。届时,师从“先贤”路线的当局再向“先贤”们献上其修改好的新宪法作为最大的祭品,隆重纪念一番也为时不晚。

概言之,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表面上的不高调,其实是与日本官方的高调修宪筹备互为表里,相互呼应的。

(注:本文系杜海怀根据2018年3月28日卓南生教授在“厦大新闻茶座”主题汇报记录重撰而成,并负主要文责)

## 参考文献:

- [1] 周刊东洋经济. 东京:东京经济新报社,1991,21.
- [2] 卓南生. 揭开“三岛美学”的面纱//日本社会(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三卷本).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263.
- [3] 吴学文,卓南生. 日本会成为亚洲孤儿吗//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79;50.
- [4] 卓南生. 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3.
- [5] 张铁柱,刘声东主编. 甲午镜鉴:日本对外扩张与舆论诱导——辨析日人‘日清战争’观背后的逻辑思维.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14:324-334.
- [6] 三谷太一郎. 日本の近代とはなんであったか:問題史の考察. 东京:岩波新书,2017:144-146.
- [7] 许介麟. 近代日本论(日本文摘书选12). 台北:故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2:69;22.
- [8] 中村政则. 怎样看待司马史观的质疑//岩波小册子. 东京:岩波新书,1977,427.
- [9] 竹内好著. 近代的超克. 孙歌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2-293.
- [10] 井上清. 戦後日本の歴史. 东京:现代评论社,1966:20.
- [11] 卓南生. 大国梦与盟主论——总保守化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128.
- [12] 卓南生. 源自东京的亚细亚主义为何令人生畏//日本社会(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三卷本).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467-469.

## Japan's Modernization Model and the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in Its Official System

*Zhuo Nansheng, Du Haihuai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in Japan. Compared with the high-profile celebration and a series of well-planned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the “centennial sacrific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1968),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his year is extremely low-key. However, under this low-key appearanc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re actually hiding their intention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controversy of the “centennial sacrifice of Meiji restoration” l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half a century ago (1968 is the so-called era of “dichotomy of state theory”. “state theory” refers to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 Japan had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s on where Japan should go at that time. In short, public opinion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side “supports the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and the other side “opposes the Japan-US security treaty”. The supporters’ insistence on forming a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otenti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faction. The opposition forces are the so-calle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action” and the two forces face each other. ) and Sato’s cabinet’s long-term divisive strategy towards the “anti-war camp” at that time. (such as using textbooks and mass media, etc. ).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create “public opinion”, Sato government also planned a large-scale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it was the 1964 Tokyo Olympics, 1968 Meiji restoration centennial festival and 1970 Osaka world Expo. This theory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 reason for the resurgence of today’s “successful theory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model”. In other words, Japan’s modern history, including its track of invasion of Asia, has been affirmed by advocating the success of “Japan’s modernization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packaging and promotion of pre-war theories including “ABCD encirclement theory” and “modern ultra theory” in Japan’s conservative academic circles, the phenomenon of reproduction and even “export to domestic market”, reveals the truth and legacy of “Asia doctrin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ssence of any “Asia doctrine” originating in Tokyo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clusion framework of “Japan is the leader of Asia”.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s long as the Japanese do not give up their prewar view of history, the gap between Japan’s and Asia’s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history is widening rather than narrowing.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current low-key political agenda and “public opinion” trend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 meiji restoration; on the dichotomy of countries; modernization mode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

■ 收稿日期: 2018-07-29

■ 作者单位: 卓南生, 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 福建厦门 361005

杜海怀(通讯作者),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华侨大学外语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 责任编辑: 刘金波